

問津文庫

主编
王振良

九河寻真

2014

万鲁建 编

門
庫文津問

主编 王振良

九河尋



2014

方魯建 编

图书在版编目(C I P) 数据

九河寻真. 2014 / 万鲁建编. -- 天津 : 天津古籍出版社, 2015.12

(问津文库 / 王振良主编)

ISBN 978-7-5528-0367-9

I . ①九… II . ①万… III . ①天津市—地方史—文集
IV . ①K292.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85309 号

九河寻真. 2014

万鲁建 编

出版人 / 张玮

*

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300051)

<http://www.tjabc.net>

今晚报社印刷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23.375 字数 510 千字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28-0367-9

定 价: 59.00 元

探赜索隐，钩深致远

郭凤岐

乙未年初冬，半个多月的阴雨连绵，使人们心中像是蒙上一层雾霾。当我拜读过王振良和万鲁建合编的《九河寻真·2014》书稿后，沉闷的心情，如羯鼓解秽般地为之一扫，欣然而喜。

两君年轻有为，才高意广。尤其振良主持问津书院以来，助推天津文化历史研究，别开新的生面，主编的一批著述成果相继问世，为天津的学术研究和文化建设，添珠加玉，其功赫赫，堪称天津学界的幸事。

《九河寻真·2014》，共收录文章 69 篇，外有附录多篇，近 38 万字，分为社会与文化、风俗与史迹、人物与事件、综述与随谈等四个板块，以及卷首序言，卷尾后记。该书内涵丰厚不冗，内容广泛不紊，体例规范不散，文字质朴不华，其中不乏精彩篇章，多有生花之笔，特色鲜明，异彩纷呈。

具体而言，至少有以下特点：

一是文化性。纵观全书，文章的数量多，除了第一个板块的文

化，第二个板块的风俗之外，其他板块也都有文化内容和元素；研究的范围广，包括金融、教育、科技、建筑、文艺、戏曲、民俗、非遗等；涉及的类型广，有传统文化、有现代文化，有城市文化、有津郊文化，有社区文化、有园林文化等。任何一个文化的轮廓，都是一幅不同的图景。“繁略殊形，隐显异术”的丰富文化内涵，营造了贯穿该书的一道风景线。

二是学术性。所谓学术性，就是对问题进行专门、系统研究的程度。学术的范围十分广泛。书中有的学术论文，从历史和现实两方面对问题进行探讨，对相应学科的发展有积极意义；有的文章重在理论探讨，提出了新的观点；有的调查类文章，具有创见性，论题有学术价值；有的分析论述文章，观点表达充分，论述言简意赅，知识性、可读性强；有的专题综述文章，有较强解释力，综合力，有助于事物的比较研究；有的考证性文章，发掘深入，能提出新知新见；有的资料性文章，所用文献具有权威性、可靠性，所述观点与资料相辅相成。如此等等，学术气氛浓厚，该书当自树其帜。

三是创新性。这是该书又一特点，其结集文章，或创意，即立意新、理念新；或创见，有与众不同的见解；或创题，选题、论点新颖；或创法，研究方法创新；或创述，论述方式、角度新鲜；或创言，即语言生动、精炼，乃至新奇。唐代杰出文学家韩愈主张，文章“师其意，不师其辞”；韩之弟子李翱比老师更进一步，在《答朱载言书》中说：“创意造言，皆不相师。”该书正是坚持了既创意又造言，创新亮点俯拾即是。

四是求真性。所谓“求真”，就是“求是”。该书无论是洋洋万言的大文章，还是精雕细刻的千字文；无论是社会、历史、文化、事件等重要课题，还是一砖、一刀、一针等以小见大的小题目，皆有对真

谛、真相、真迹、真理的追求。明代郑仲遠在《耳新》中说：“有真文章者，必有真人品。”

求真性，本来就是该书的题中之义。我特别欣赏《九河寻真》这个书题。在物欲膨胀的情况下，一批专家学者，矢志不移，在天津“九河”这个舞台上，苦心孤诣，寻寻觅觅，“探赜索隐，钩深致远”，着实令人钦佩！

我们心中都有一个天，那就是“天津”。这个天（九河），为我们提供了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在文化发展日新月异的21世纪，人们常把问题放到大的人文背景下，作深层次的思考和研究。“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易经·贲卦》）我理解，人文的含义就是文化与文采。人文求善与美，科学则求真，两者和谐统一为真、善、美，这就是人文文化价值的体现。在天津文化历史研究中，追求人文文化价值，探寻真、善、美，实乃善莫大焉！

权为序。

2015年农历小雪之日

目 录

001 序言：探赜索隐，钩深致远 / 郭凤岐

社会与文化

- 003 民间社会的成长与城市的现代转型
——以清末天津为对象的考察(李学智)
- 022 从“尚公、尚武、尚实”到“允公允能”
——严修对教育宗旨的探索及其对南开校训的影响(陈鑫)
- 032 李叔同致徐耀廷信札的史料价值(章用秀)
- 037 “鹿鸣”是吴秋尘笔名(侯福志)
- 039 《十二金钱镖》的作者不是宫白羽(倪斯霆)
- 043 海与盐蕴育了新剧种——评剧(付凤珍)
- 052 章式之先生的藏书
——读《章氏四当斋藏书目》札记之一(李炳德)

- 060 汉沽飞镲的历史传承与嬗变(李瑞林)
- 073 “和平”奏响九十载 乐界共叙钢琴情
——中国钢琴艺术90年学术研讨会综述(刘恒岳)
- 079 玉祥理发店(苗睿)
- 083 “KMA”老砖与天津(由国庆)
- 088 清代天津的士绅慈善家述论(任云兰)
- 106 民国时期《北洋画报》中知识分子的国家想象(孙爱霞)
- 112 试论天津日租界的“殖民空间”(万鲁建)
- 127 小剧场话剧演出探究
——曹禺剧院小剧场话剧演出(王海冰)
- 136 改革文学与国家现代化想象:以蒋子龙为例(闫立飞)
- 141 从文化群落说到天津文化特征
——天津文化内涵略论(张春生)
- 156 严修与城南诗社(杨传庆)

风俗与史迹

- 171 我所知道的“三不管”(王文玉)
- 185 天津河西老街道形成与发展(尹树鹏)
- 195 天津铁路与天津城市近代化发展(曲振明)
- 210 杨柳青年画在《益世报》上的传播(方博)
- 220 天津皇会中的“公益会”
——河北窑洼果子店梅汤圣会(高惠军)
- 227 天津俗谚与俏皮话(谭汝为)
- 238 八大馇与我们的生活(李子胜)

- 249 民俗不是俗事(郭文杰)
- 263 民园往事(金彭育 金朝)
- 271 围堤道的堤在哪儿(刘利祥)
- 275 兴文风,开文运
——清代天津方志中的崇文建筑(吴裕成)
- 285 古人诗词中的三岔河口(谢彦 韩吉辰)
- 289 天津水西庄研究三则(叶修成)
- 297 河西务:元代“马拉松”起点(张博)
- 300 流行岁月(张建 / 文 王玉荣 / 图)
- 318 鉴赏家乡“大直沽古貌草图”(梁广中)
- 332 “天津市忠烈祠”再发现(张翔)

人物与事件

- 343 被遗忘的大教育家黄钰生(高成鸾)
- 360 从天津走出的中山陵设计者——吕彦直(葛培林)
- 370 甄光俊:度曲有道是中国戏曲的永恒魅力(管淑珍)
- 378 盐商查有圻的历史与传奇(吉朋辉)
- 382 馆阁体书法纛旗:华世奎(姜维群)
- 385 严复:“吾系卅年老天津”(井振武)
- 408 探寻抗日记者朱晓芙遇刺事件(刘礼宾)
- 413 严智开与梅贻琦、闻一多(齐珏)
- 416 冯武越与《北洋画报》(王晏殊)
- 419 李大钊与北洋法政专门学堂新考(王勇则)
- 451 李大钊曾有机会担任直隶公立法政专门学校校长(刘国有)

- 457 颜一烟:家族里的一个和八个(徐凤文)
- 465 布衣大师阎道生(阎伯群)
- 471 石破天惊徐嘏龄(郭凤岐)
- 474 栖鹤亭中的蓝云先生(张金声)
- 481 著名作家诗人画家管桦(张绍祖)
- 487 戏曲界的贴心市长李耕涛(甄光俊)
- 496 方地山与天津(周利成)
- 511 韩慕侠与中华武士会(朱国成)

综述与随谈

- 519 大气磅礴 装满历史
——大型人文纪录片《五大道》的独特历史魅力(罗澍伟)
- 527 2013年天津史研究综述(张利民 高鹏)
- 544 正义的胜利
——日本战败投降69周年之际回顾日本侵略者在津所犯罪行(方兆麟)
- 557 孙犁晚年的一场婚变(刘运峰)
- 579 天津市非遗保护存在的问题及建议(王振良)
- 587 邓小平与天津改革开放(王凯捷)
- 600 百年“袁大头”(罗文华)
- 614 田野调查与天津都市文学研究(张元卿)
- 624 九畹滋兰,不尽芳菲愿
——写在叶嘉莹先生九秩大庆之际(宋文彬)
- 630 王懿荣后代在天津(孙肇净)

- 632 王煥曾主狮子林? (宋健)
- 635 民国天津城南诗社的池州人(吴熙祥)
- 637 《严复的一生》前言(严孝潜)
- 648 苗刀·运河·中日交流(杨祥全)
- 667 口述历史学术属性的探讨(杨志垣)
- 678 中国芒针两篇(周醉天)

附录

- 685 天津:充满魅力的人文之都
——第二届问津学术年会综述(曹宪仁)
- 701 探寻天津的城市文化(王洪波)
- 705 碰撞与阐释
——第二届问津学术年会第一组讨论小结(尹树鹏)
- 711 探讨与交流
——第二届问津学术年会第二组讨论小结(王勇则)
- 715 创新与共鸣
——第二届问津学术年会第三组讨论小结(万鲁建)
- 719 第二届问津学术年会征稿启事(杜鱼)
- 721 第二届问津学术年会邀请函
- 722 第二届问津学术年会文章目录
- 726 第二届问津学术年会日程
- 728 后记:问津的“近代”(万鲁建)

社会与文化

民间社会的成长与城市的现代转型

——以清末天津为对象的考察

李学智

近年来,关于中国近代民间社会及传统城市的现代转型问题,成为学界关注的领域之一。兹拟考察清末天津民间社会团体建立及开展活动的某些情况,以期说明当时天津城市社会生活已开始向现代的转变。

—

中国的民间社会古已有之,主要表现为有一些以血缘、地域关系维系的互助性团体、帮会以及慈善救济性质的组织。近代中国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出现和发展,产生了资产阶级和新型知识分子等新的社会阶层,“民”的构成发生重要变化,民间社会组织及活动内容和方式亦随之发生相应变化,其理念、宗旨和组织原则及运作方式,均与中国传统的民间社会出现了重要区别。这种新型民间社会“一般都是脱离国家直接控制和干预的社会自治领域,拥有相当

程度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其组织内部“主要依靠的是契约规则，而不是靠传统的血缘、乡缘等亲情关系维持”，实行“自愿和民主的原则”。^①这是伴随着中国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过程而发生的一个重要的社会变化。清末十年间，中国部分省区，主要是东部沿海及长江沿岸若干大的通商口岸城市，出现了具有现代性的社会团体纷纷建立的情况。

天津是当时中国北方最大的通商口岸。天津自 1404 年设卫，至 1860 年开埠之前，400 余年间，由一个军事卫所发展为地方行政中心。1860 年天津开埠通商，由于其地处京畿与海口的独特地理位置，天津一变而成为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联系的窗口。近代军用、民用工业陆续兴办，新式学堂如水师学堂、电报学堂、武备学堂、医学堂及北洋西学学堂（北洋大学前身）等渐次设立。作为对外贸易口岸，加之其政治、军事地位的上升，天津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稳步发展，城市人口快速增加，渐成为华北地区乃至中国北方的经济中心。天津的社会结构也发生重要变化，近代工商业者、新型知识分子阶层的开始形成，近代西方思想文化及社会习俗，开始影响天津的社会生活。

经庚子之变，清廷已无法再照旧统治下去，被迫实行“新政”，开始在经济、法律、教育、军事等诸多领域进行变革。1902 年 8 月，袁世凯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身份，代表清政府从八国联军的都统衙门手中收回天津的管辖权，并开始了所谓“北洋新政”。袁世凯组建了中国近代新式的警察队伍，建立警察机构，政治维持社会治安秩序；接管并完善了都统衙门遗留下的市政管理机构，进行了

^① 朱英：《论清末民初社会与国家的发展演变》，《理论月刊》2005 年第 4 期。

一系列的市政建设；以及兴办教育，整顿金融，鼓励开办近代工业，开发海河以北的新市区，推行地方自治，等等。^①

在这样的背景下，清末十年间天津经济社会生活发生了重大变化。据统计，1902—1911年间，官办、官商合办、中外合办企业增加了31家。其中官办12家；官商合办7家；官督商办3家；中外合办3家。^②此期间，私人资本企业迅速增长，发展到107家，涉及的门类有：矿业、机器、纺织、面粉、榨油、火柴、皮革、玻璃、制碱、烟草等。^③商业、进出口贸易、金融业也均在快速发展。^④同时，天津的文化教育事业也有很大发展，新式学堂纷纷建立。到1911年，天津的新式学堂有：大学堂1所；高等学堂3所；中等学堂7所；男小学堂89所；各类女子学堂23所；其他各类学堂24所；外国人所办学堂6所。^⑤到1911年，已办有各种报刊数十种，如《大公报》《北洋官报》《天津商报》《竹园白话报》《天津白话报》《北方日报》等。其中《大公报》积极宣传新思想，倡导新风俗，推动社会生活改良，发行量最高，影响最大。

开埠通商以来天津经济社会的变迁，“清末新政”及“北洋新政”的实施，为天津民间社会的成长提供了有利的社会政治环境。

①参见罗澍伟主编：《近代天津城市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18页及以下。

②《清末天津官办、官商合办、中外合办工业统计表（1902年—1911年）》，天津市档案馆等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262—1267页。其中6家企业性质不明。

③宋美云、张环：《近代天津工业与企业制度》，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32页。

④参见罗澍伟主编：《近代天津城市史》第10章相关内容，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⑤罗澍伟主编：《近代天津城市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81—487页。

二

清末天津民间社会的成长，主要表现在各种民间社团的组建和积极的活动。以下择要考察有关情况。

天津商会在清末天津民间社团中无疑占有最重要的地位。

天津商会建立于 1904 年。此前的 1903 年 3 月，天津商人在上海商业会议公所建立的影响下，洋布绸缎、粮食、银钱等各行商人纷纷公禀，以联络商情、整顿和挽救天津市面，要求设立天津商务公所。经众商推举和袁世凯委任，卞煜光、王贤宾等为公所董事，另有襄理、督办若干。5 月天津商务公所建立。1904 年清政府颁布《奏定商会简明章程》(也作《商会简明章程》)。天津商人上书商部和直隶总督，要求将商务公所改为商会，以发展天津商务。^①1904 年 11 月，天津商务总会建立。

天津商会的建立，反映了当时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随着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中国传统的商业性公馆、公所，带有明显的血缘和地域特征，具有封闭性、排他性，机构设置杂乱，管理缺乏民主，严重束缚着其成员，已难以适应商品经济的挑战，^②建立商会组织已是大势所趋。

清末天津商会除了参与整顿市场秩序、倡导振兴实业、仲裁商事纠纷、创办商业报刊和各种实业学堂等与工商业发展本身有直

^①《公裕厚等六十一户商号禀请将商务公所改为商会并公推宁世福王贤宾为总协理文》，《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30 页。

^② 参见宋美云：《近代天津商会》，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69 页。